

千里機緣一線牽：

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入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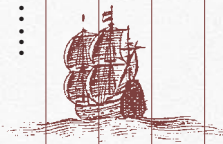
圖書文獻處

「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

將於本年五月十九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在本院正館 204-206 室展出，

這份遠從德國來的贈禮，實繫於一份難得的機緣。……



一、入藏記

二〇〇四年二月底，本院「天子之寶」結束德國波昂最後一站展出，筆者奉派與器物處、書畫處同仁到波昂押運展出文物赴歸，正當我們忙碌卸展之際，教育部駐德代表曹培林先生向我們表示，有一位日裔德籍教授要將一批西洋古地圖捐贈給本院，查詢本院是否有意願典藏。由於本院接受捐贈有一定的程序，我們應先了解捐贈文物，再作決定。於是書畫處何傳馨先生與筆者在卸展工作告一段落後，便在曹培林先生的安排下，拜訪

了飯塚一 (Johannes Hajime Izuka) 教授。

飯塚教授的家位於波昂市區不遠處，搭乘公共汽車十多分鐘就到了，是一棟普通公寓的三樓，我們一行三人抵達時，飯塚教授早已準備妥當，將三十多幅欲捐贈的地圖，掛滿在並不寬敞的客廳、餐廳及走廊牆壁上，一看是這麼熟悉的地圖，也是本院圖書文獻處近年來有意增廣典藏的作品，便立即向飯塚教授表達了感謝捐贈的美意。筆者並未從事西洋古地圖研究，然機緣湊巧在二〇〇三年一月



飯塚教授及夫人攝於波昂家中，壁上懸掛的即為捐贈地圖，地圖上所貼黃籤，為臨時登錄編號。馮明珠攝

二十四日至五月三十日主辦了「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數十幅來自歐洲各大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及台北外國收藏家的西洋亞洲古地圖，經由筆者之手點驗、布展、裝箱、歸運，讓筆者初次接觸到西洋古地圖；卸展後又以「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為題於台南

市再作展出，爲了充實展覽，又向國內收藏家借了數十幅與福爾摩沙有關的西洋古地圖，這是筆者第二次接觸到西洋古地圖。正因爲有這兩次經驗，讓筆者得以認識飯塚教授的收藏，立即向仍忙著卸展的嵇處長及台北院長室報告了此事，並開始與飯塚教授洽談接收的方法與手續。

飯塚教授及夫人十分高興的拿出紙筆協助我們編號、拍攝、登錄，以先做一份簡單的捐贈清單，並一幅幅細說時代背景與品名，便於我們點收登錄。外出午飯後，飯塚教授又積極帶我們購買包裝紙張與繩索，希望我們當日將地圖帶走。由於種種考量，



康熙畫像 橫一八公分 縱二八公分 十八世紀

當我們表示無法與「天子之寶」卸展文物同時帶回台灣之意，飯塚教授十分失望，露出了沮喪的神情，筆者忍不住問他：「這些地圖您已珍藏了這麼多年，為何急急送走呢？」飯塚教授回答說：「我已七十多歲了，快要

去見上帝了，我要為這些收藏找個好歸宿，貴院能將近千年的古書（指宋版）典藏得這麼好，我想我的這些地圖，若能入藏貴院，也必然可以永久保存。」不久之後，三月底，前圖書

文獻處劉錚雲處長親往波昂，帶回了這批地圖、兩幅康熙畫像與北京觀象台插圖，並於同年七月十五日完成了所有入藏手續。

二、飯塚一教授

飯塚一教授一九三二年生於東京，一九五一年考入東京醫學大學就讀，不久便離開日本前往歐洲學醫，前後歷經德國烏茲堡大學、麥茲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於一九五九年獲得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此後分別在西班牙馬德里大學醫院、英國綜合教學醫院及德國烏帕塔爾畢士達醫院接受外科訓練，一九六五年進入波昂大學醫學院行醫，於一九七三年獲得大學任教資格。飯塚教授主修腦神經外科，他在醫學上最重要的成就，應當是七〇年代成功地以極細小的內視鏡，進行人類活體腦中樞第三腦室的探索與治療，這項成就讓飯塚教授在歐洲醫學界名聲大噪，成爲腦神經外科名醫。據飯塚教授說，他對歐洲製圖學產生興趣，也始於接觸醫學人體



飯塚教授拿出家藏圖籍向我們說明捐贈地圖的時代背景 馮明珠攝

解剖圖，特別是人腦結構圖，這類圖繪在十五世紀被視為邪惡的化身，挑戰唯一的信仰，繪圖者被認定為異端而處以極刑。然則繪圖者為何冒殺身之險而為之？這便是飯塚教授有興趣探究的問題；同理，歐洲地圖學的發展脈絡與人體解剖圖一致，十三世紀

盧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 1215-1270）、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等帶回來的東方訊息，被冷藏三、四百年後，始因地理大發現才慢慢地擦出火花；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從無知、傳說、想像、推測到實地探索，都反映在地圖製作中，這道牽引西洋地圖發展史的主軸，正是飯塚教授好奇與關注的問題。因此當筆者向飯塚教授邀稿，請他談談蒐集地圖的經過與心得時，他欣然允諾，以日文撰成〈歐洲製圖學的歷史背景〉（收錄於本院出版之《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圖錄）一文，以漫談而感性的筆觸，從醫學圖繪說到地圖製作的漫長而辛酸的發展歷程。

飯塚教授於五〇年代初期便前往歐洲習醫，此後學成行醫、結婚生子、生活重心全在歐洲，但他是日本人，他關心亞洲，喜愛中國文化，年少時除了正規教育外曾學習中文，對中國文史哲學均有涉獵。飯塚教授說：「我接觸西方文化愈多，更加深

我對東方文化哲學的嚮往」，於是自七〇年代中期以後，他開始亞洲之旅，足跡幾乎踏遍中國、韓國、泰國、印度、寮國、柬埔寨、越南、中亞等地；一九八一年四月，他來台作環島旅行，兩度造訪本院，撰成專文發表於一九八五年《醫生旅行文化雜誌》（Ärztliches Reise & Kultur Journal）上；一九八二年德國DuMont Koeln出版第一本大戰後德文版中國旅遊指南，飯塚教授受聘前往中國考察；飯塚教授也常利用行醫之便，深入當時仍是共產國家的蘇聯、東德、阿爾巴尼亞，以增廣見聞。飯塚夫人告訴筆者，教授旅行喜歡逛舊書店，蒐集各種古文獻，捐贈的這批亞洲古地圖，即是歷年來旅遊的收獲。筆者細讀〈飯塚教授的學經歷〉，發現教授除了喜歡探訪各地修道院、寺廟、古剎外，也關懷少數民族，深入泰北、緬甸、雲貴、蒙古、寧夏、新疆、東北、中亞、西伯利亞及台灣探訪各地原住民。筆者深信只有真正關懷人類文化的人，方有

如此心胸，將自己珍藏贈予一個毫無淵源的博物館，只是因為被這個博物館的典藏品所感動，深信他的地圖入藏後也必能亙古長存。本院則因接收了飯塚教授的捐贈，開啓了典藏亞洲古地圖的契機，既延續了捐贈者的喜好，也增廣了典藏品的觸角。爲了感謝飯塚教授捐贈地圖的美意，特舉辦「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以誌這段藝林美事。（馮明珠）

三、「經緯天下」展內容

飯塚教授捐贈的地圖，就地域而言可分爲中國、韃靼、亞洲三部份；就製作時代與內容而言有四項特色：

其一，地圖的製作時代橫跨十六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但以十七、八世紀爲多，正好勾勒出現代地圖學發展的脈絡。

其二，地圖內容反映了中古時代、地理大發現時代、帝國主義時代，西方人對東方認識的轉變。

其三，見證了東西製圖業的交流，如羅洪先（Luo Hung-hsien, 1504-1564）的《廣輿圖》（*The Enlarged Map of China*）以及來華耶穌會士參與的康熙《皇輿全覽圖》（*The Atlas of*

東印度地圖 橫29公分 縱20公分 1608



中華帝國十五分省圖 橫四五·五公分 縱三四·五公分 一六六七



展出的地圖中。
the Chinese Empire), 均充分地顯示在

其四, 近代亞洲定義逐漸趨向明確。

依據上列特色, 展覽分四單元

呈現:

(一) 探索: 初到東方

西元一四五三年, 土耳其人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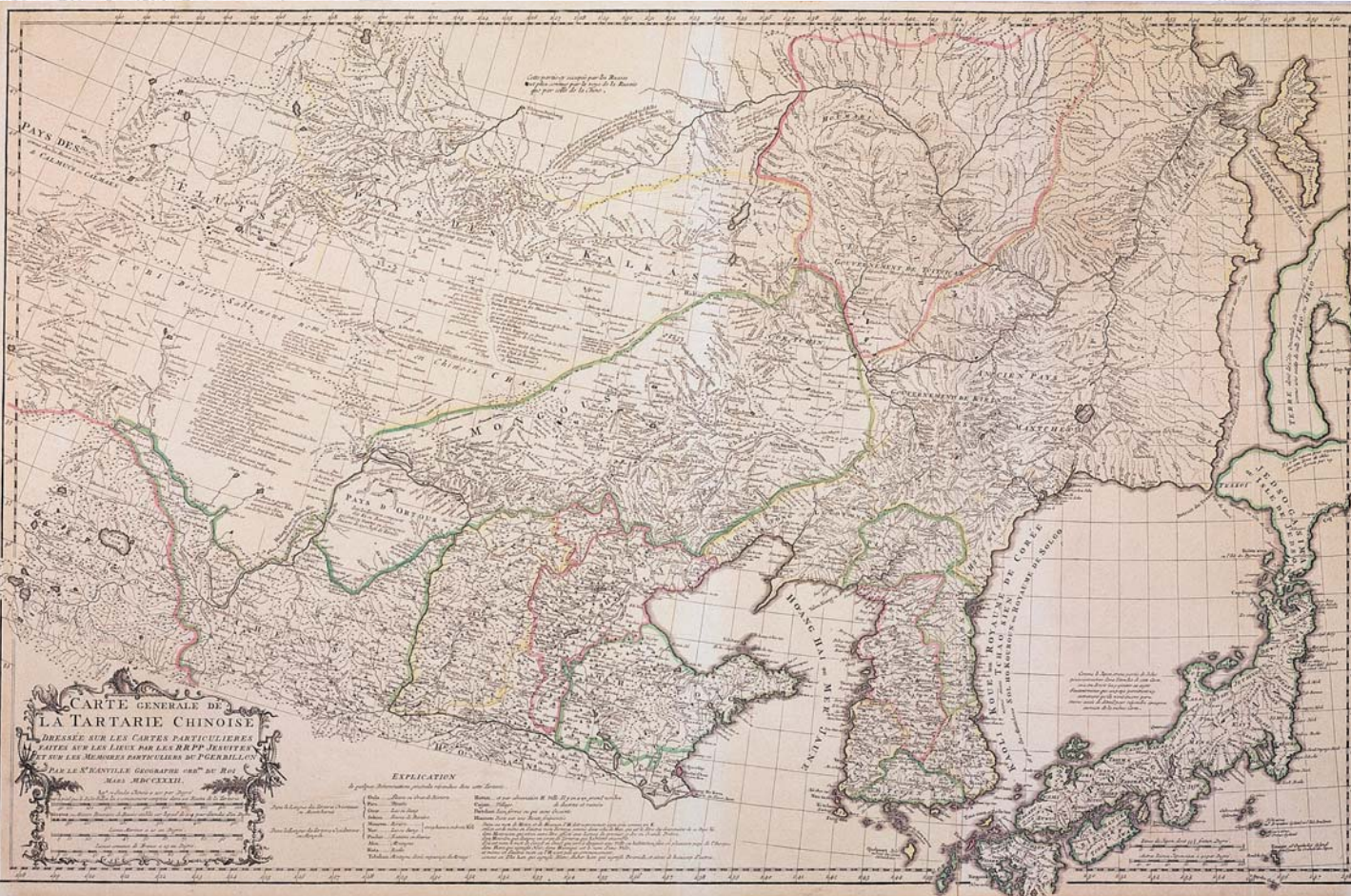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 封閉了東西貿易的陸上

通道。

當時的海權國葡萄牙、西班牙

乃轉變方向, 積極從事海上探險,

開啓了地理大發現時代。反映在地



中華鞏韜總圖 橫80.5公分 縱53.8公分 1732

圖上有三項特色：

1. 歐洲人對東方的視野不斷擴張，已超出《馬可波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描述範圍。

2. 製圖者仍仰賴傳說、教條、推測、想像與理論來描繪東方。

3. 近代亞洲範圍開始形成。

展出的「亞洲新圖」(一五八八)、「東印度地圖」(一六〇八)及「中華帝國」(一五九六)，說明了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人對東方的認識；「盧布魯丘」(William Rubruquis, 1215-1270)「蒙古旅行圖」(一七〇七)、「馬可波羅父子亞洲旅程圖」(一七二九)，雖然出版於十八世紀，卻反映了早期的製圖業者仰賴傳說、教條、推測與想像來描繪東方。

(一) 認識：亞洲在何方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荷蘭人逐漸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為海權強國，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一六〇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成為地圖印製中心，此時期西方製圖技術

與視野有突破性的進展，特色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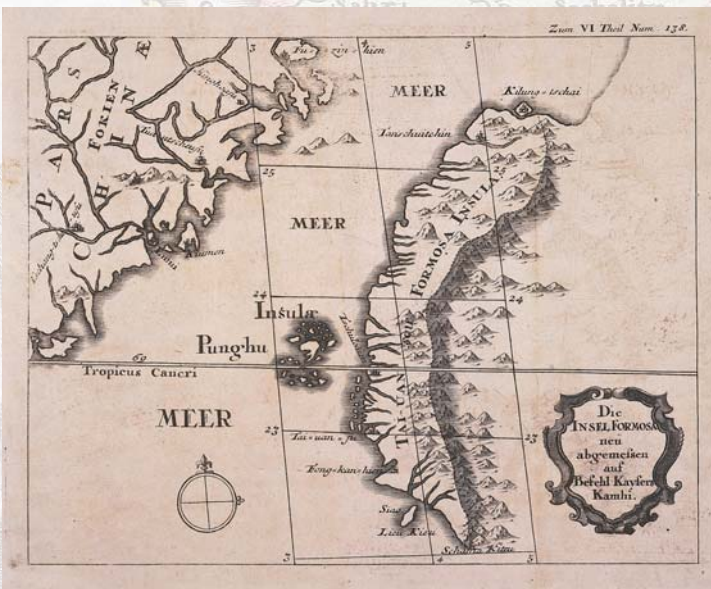
1. 在耶穌會士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中國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 的影響下，對東方的認識較之十六世紀早期更為精確。展出的「中華帝國十五省分圖」(一六六七)、「大明國圖」(一六五〇)、「中華帝國圖」(一五九〇)、「中華帝國新圖」(一六六一或一六七二)及「中國」(現代複製一六〇六年圖)地圖，對中國省份的描述極為詳細，臺灣、海南島與朝鮮半島等已在地圖中顯示。
2. 「亞洲圖」(一六〇七)與「韃靼圖」(一六〇七~一六二一)，明顯受到羅洪先 (Luo Hung-hsien, 1504-1564) 《廣輿圖》(The Enlarged Map of China) 的影響。
3. 在西方製圖者的定義下，近代亞洲範圍漸臻成形。
4. 地圖紋飾華麗繁複，是時興的

居室裝飾作品。

- (三) 交流：計里畫方與經緯線
-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荷蘭的製圖業轉由新的海上強權法、英取代，地圖製作風格也開始擺脫阿姆斯特丹式的華麗，轉向實用。開風氣之先者是法國製圖家尼古拉斯·桑松 (Nicolas Sanson, 1600-1667)，他在一六五二年根據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ele Pomplio Ruggieri, 1543-1607) 的《中國分省地圖》(Imperium Sincuum Sinis Tamin J590 [1590])，出版了《亞洲地圖集·中華帝國地圖》(一六五二)，付予地圖的實用價值，桑松的製圖風格影響歐洲製圖業直到十八世紀末葉。
- 另一位法國製圖名家唐維爾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他以《皇輿全覽圖》為基礎，出版了「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一七三四)、「中華韃靼總圖」(一七三二)、「西伯利亞與韃

靼圖」(一七五三)，內容上已有明顯的實測資料。再者本單元展出的「中國圖」(一七七七~一七八三)、「中國韃靼圖」(二七七九)及「福爾摩沙島圖」(一七二五)等，都明顯的受到康熙朝來華耶穌會士測繪地圖的影響。十八世紀以後，英國取得殖民優

福爾摩沙島圖 橫三公分 縱一九公分 一七五



勢，深入轄地，反映在地圖繪製上是更爲精準，締造了英國在地圖繪製史上的後來領先地位，如展示的「中華帝國」（一八八三）已與現代地圖相

去不遠。

（四）聚焦：歐洲人眼中的東方

隨著中古時代，地理大發現時代，殖民時代，西方人對東方的認識



俄羅斯帝國新圖 橫36.7公分 縱28.5公分 1708

也從探索、陌生、初識到全面瞭解，本單元的展件充分描述了這樣的發展脈絡。例如第一單元展出的「馬可波羅父子亞洲旅程圖」、「盧布魯丘蒙古旅程圖」及本單展出的多幅「韃靼圖」（一七〇七、一六五七）等完全是依據遊記、口耳相傳與想像臆測繪製而成；但在一七二九年出版的「亞洲新圖」中，已將近代亞洲範圍定義完成；「廣東上川島」（一七二九）將珠江口外一個小島位置圖繪製的如此精確，代表

歐洲人已深入東方。

（五）繪圖工具

此次展覽還需感謝長榮文化基金會的協助，承蒙提供所藏繪製地圖工具的展示，使繪圖的人與看圖的人有更密切的古今會通。（盧雪燕）

四、展覽圖錄

配合展覽，我們出版了一本圖錄，將飯塚教授所捐贈的這些珍貴的文化財全部刊錄，除了誌記這段難得的千里機緣，也在呈現這些地圖背後人們對世界、對亞洲的概念。一如石守謙院長在序文中所提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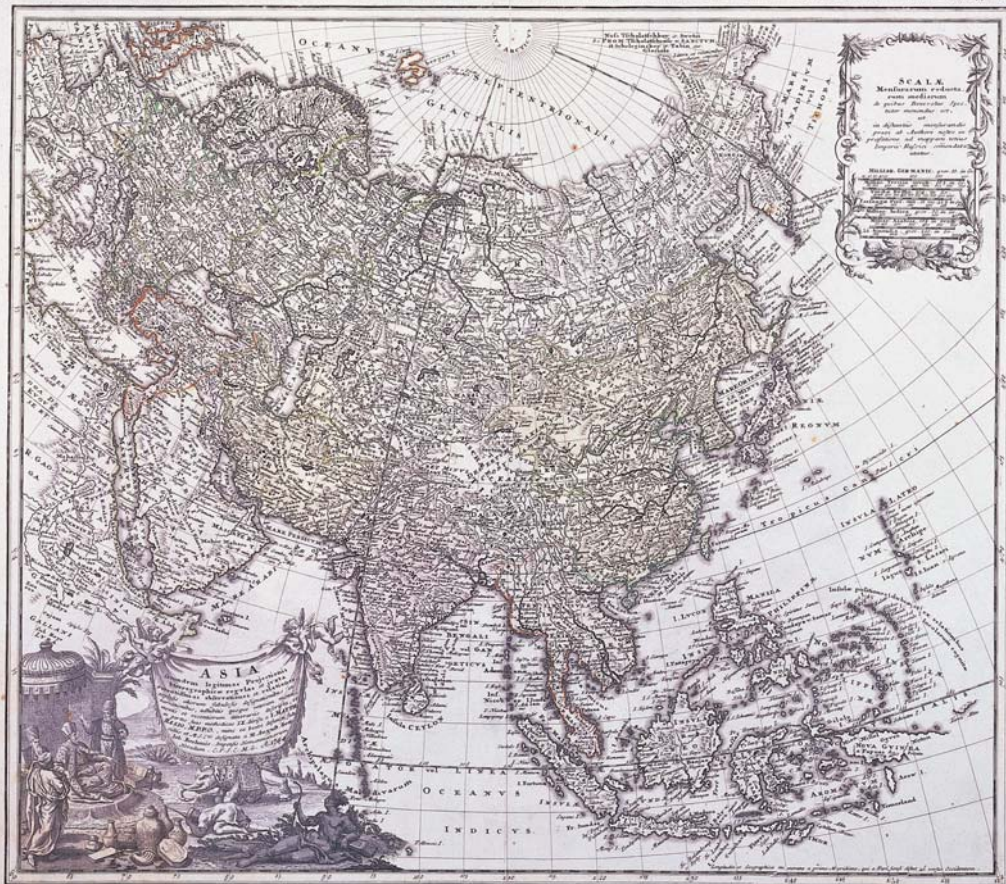
地圖之製作，記錄著人們對已知及未知的地理空間的掌握與想像的知識。它因此有一個悠長的歷史，在變化的過程中呈現各不同人群探索、試圖控制活動空間的故事。飯塚教授所蒐集的古地圖大都出自歐洲，時代橫跨十六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但以十七、十八世紀為大宗，而其對象，無論地區大小，實則皆是針對「亞洲」

此一區域。這個重心正呼應著西方自十六、十七世紀之際起，向東方世界進行探索、理解，甚至控制的具體結果。「亞洲」此一概念，在此地理區域內生活的人們心中，原不存在，而是此時期歐洲向外探索的附屬創造。他們此時所製作的有關亞洲之地圖因此不僅紀錄著「亞洲」概念的形塑過程，甚至歐洲向東方擴張史的足跡，對於後來被稱為「亞洲」國家內的人們而言，更有深長的意義。這些地圖除了反射自己「被發現」的窘境外，對於將來新的自我認同的形構，也具有深刻的參考價值。

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而言，飯塚教授的捐贈也有非凡的意義。從二〇〇四年開始，我們投入了許多力量來籌劃在嘉義的南部院區，它的格局即定位在亞洲的藝術與文化，試圖透過對「什麼是亞洲」的思考，來尋求亞洲的定義與新定義的可能。故宮此次有幸得到這批古地圖進入典藏，正好能讓我們以新的材料更積極地投入這個工作。這正是故宮推出此飯塚教授捐贈展時的心情。

■

Carte de L'ASIE, projetée Stereographiquement, tirée des Relations et Observations, contenues dans les voyages modernes, de même que dans les monuments des anciens, corrigée de tout ce qui n'est la suite, et dirigée en la IX. Partie methodique par le Sr. L'HOMANUS, Prof. des Mathem. Sicillies, et depuis par Sr. Aug. Louis Bouchard, Maître en Arts. Aux Despens des Libraires de Rouen. L'An 1744. A Paris.



亞洲圖 橫五三公分 縱四八·五公分 一七四四